



习俗杂谈



水烟袋

□孙同林

老屋拆迁的时候，在一张旧橱柜里我发现一根水烟袋。水烟袋是黄铜的，高约25厘米，底座上有两个大孔，一个用于插烟袋，一个作烟缸；在烟袋与烟缸之间有一小铜扣，用来系线，以固定烟袋与底座。底座是烟袋的托子，吸烟者在吸烟的时候就托着烟袋底座。烟袋底座的外面刻有铜画，可惜，因为磨损严重，画面已经模糊不清。

看到这个烟袋，我就仿佛闻到了一股陈年的水烟味，里面混杂着祖父的气味，父亲的气味，还有西场大多、徐大大、龚队长等人的气味。

夏天，突如其来下起一场雨，在我家附近地里劳作的人们纷纷来我家避雨。人们或坐或站或蹲，很快把我家的小屋挤满了。他们有的穿着草鞋有的赤着脚，脚上满是泥水，在屋子的地上留下一片湿漉漉的脚印，人们有些过意不去，祖父却一再说没事。晚年的祖父很受人们敬重。祖父热情地招呼着他们，递上自己水烟袋，水烟袋便在他们手上传递着。

吸烟人的形象大抵是相似的，口对着长长的烟袋嘴，眼睛半眯着，低头咕噜咕噜地猛吸一阵，然后，抬起头来，停顿片刻，我想，那一定是让烟在腹中回旋、回味，慢慢地，从口中缓缓地吐出一圈圈烟雾来，然后，拎起烟哨子（装烟的烟锅），嘴里逼着气呼呼地吹掉烟灰。

龚队长吸烟的时候总是咳嗽，吸一阵咳一阵，再吸再咳。有人骂他：“都咳成这样，就别吸了吧。”咳完之后的龚队长笑笑说：“不吸，我咳得更厉害呢。”有人笑：“依你说，吸烟倒是可以治咳嗽的咧！”吸过了，他们一个个显得比平时有精神多了，这时，那雨竟停了。他们拍拍手，站起身来，道一声谢，一个个心满意足地走出屋子，又投入到地里的农活里。那阵雨就好像是专门为他们吸烟休息准备的。祖父满脸堆着笑送他们走出门去，嘴里还在念叨着休息的时候再来之类的话。

夏夜，祖父坐在门前的场院里纳凉，邻居又三三两两地走拢来，散散地坐在他周围，水烟袋照例从这个人的手上接到另一个人手上。他们一边拉呱一边吸烟。暗影里，我只听到一阵咕噜咕噜的声音，看到忽明忽暗的火光，烟草的味道在空气中弥漫着。看他们吸烟，我从中发现了一个秘密，不吸烟时，他们的手不停地拍打着蚊子，一经吸烟，他们就安静下来，那蚊子也好像不再叮咬他们了，我猜想，水烟的气味或许是最好的避蚊剂和镇静剂。

常看祖父吸水烟，我从中也了解了一些吸烟常识。首先烟袋水的添加有讲究。烟袋水太多了，容易吸入口中，水太少，没到过滤作用，烟会直接进入食管，呛人，也起不到过滤作用。方法是含一小口茶水，从吸烟管慢慢注入盛水斗，然后试着吸，待烟袋里发出清脆的“咕噜噜、咕噜噜”声即可。装上烟丝之后，因为气流受阻，“咕噜噜”的声音就会变得绵长悠扬，听起来十分悦耳。其次是烟袋水要常换，烟袋要常洗（叫荡烟袋），以保持烟袋的清洁。烟袋水日子一长，就会变得黏稠，黏稠的烟袋水吸起来费劲，也不卫生。但是，黏稠的烟袋水也有用场，一是水田里有蚂蟥叮到手脚上，蚂蟥身体的两头有吸盘，不吸足血，不会松口，摘都摘不下来，这时，只需用烟袋水在上面一点，蚂蟥便会自动松口，滚落下来；二是小孩子没来由的腹痛，这时，烟袋水就成了一种家用的救急镇痛药物。

吹纸媒子是吸水烟袋的一项重要技术。吸水烟很费火柴，每吸一锅烟必须用一根火柴，一个会吸烟的人，每次吸烟都在三锅烟以上，算一算，一天可能就要用一盒火柴。吸烟的人舍不得吸一锅烟就划一根火柴，因此，发明了纸媒子。纸媒子又叫水烟媒子，用粗纤维的火纸手工搓成，这种小纸卷必须不紧不松，恰到好处，吸烟时点着它，并不点燃，只是留一点火星，夹在手指间，待装好一锅烟，将暗红的火头送到嘴边，撮紧嘴唇，舌头一伸一缩之间，送出一股急速而短促的气流，“呼之——”一声，气流喷在火星上，火头一红，一团明火跃上纸媒的端头。这个技巧很不容易掌握，纸媒子太松，来不及吸，一下子就燃完了；纸媒子搓得太紧，吹起来不容易吸。这件事，我小时候没少练，“呼之——呼之——”半天都吹不着，或许正是这个原因，让我没有走进吸水烟行列。

对祖父吸烟，印象最深的是冬天，手捧水烟袋的祖父，坐在门脸儿的太阳底下，阳光从树枝间筛下来，覆盖在他身上，暖洋洋的样子，他坐在一圈光晕里，咕噜咕噜地吸烟，旁边坐着西场大多，有时还有徐大大和其他几个老人，烟袋在他们手上传来传去，他们一起唠家常，说些他们的过去，那些我所不知道的人和事。烟草的味道在空中飘散着，闻上去竟是很香，那样的时光，恬静而悠然……

我将水烟袋捡起来，擦拭干净，放到新屋我的书橱里，古朴的烟袋与我的书架竟是那样地熨帖。我坐在书桌前，目光每每扫见它，心里便会有欢喜跳出，从前的那些日常事，从它身上一一反映出来，好像从未走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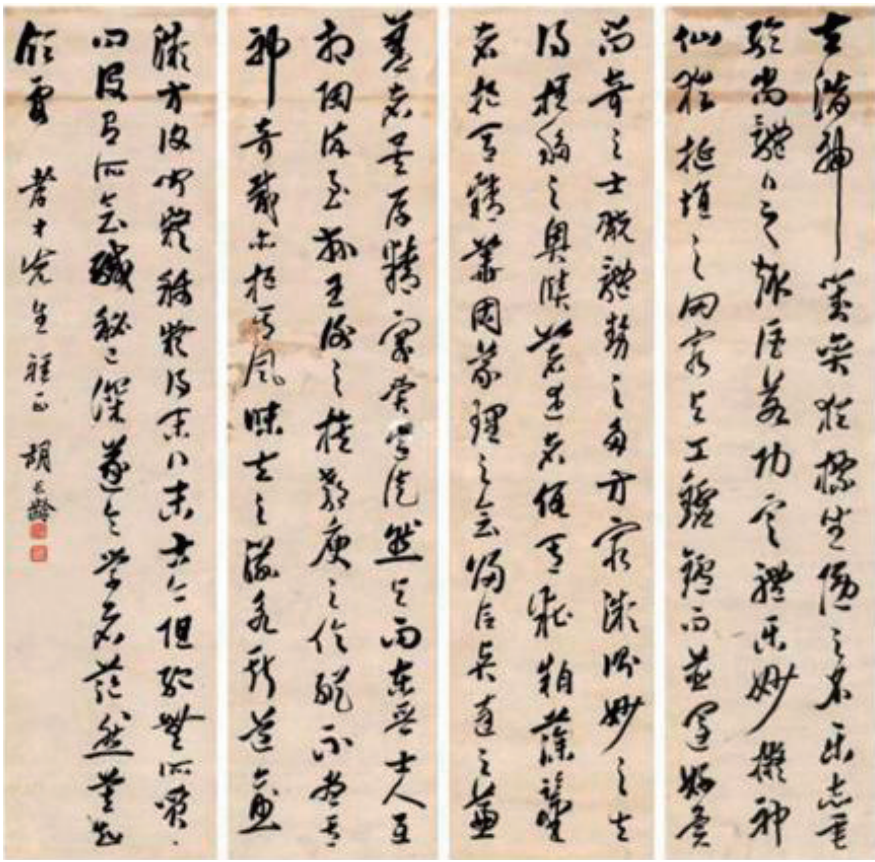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胡长龄：刚正不阿的南通第一个状元

□韩醒生



胡长龄手迹



胡长龄著作《三余堂存稿》书影

为借这个名字图吉祥，就把胡长龄提拔为第一，封胡长龄为状元。当时文人有笔记称之为《胡长龄以名得大魁》（《清稗类钞·五》）。

胡长龄为官清正廉明，刚正不阿，反对趋炎附势，曾多次智斗当朝权倾一时的和坤，表现出机智果敢、不畏权势的个性。

胡长龄考中状元后，按礼节，就是当朝宰相和坤的门生，应该去拜谒和坤。可是胡长龄却因为不齿和坤的作为，不愿结交，就没去拜谒和坤。和坤十分恼火，就让胡长龄当了翰林院修撰。这在朝廷是一份没有油水的“清差”，这一瞭就是10年。朋友看他日子过得太清苦，就悄悄在和坤做寿时，用乌贼鱼的墨汁仿照胡长龄的笔迹写了一副寿联，送给和坤，并解释说，由于胡长龄太穷，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可出门做客，不能亲自来贺寿。和坤这才让他去山东任学政。事后，朋友又同样替他写了一个谢帖送给和坤。

胡长龄一生唯嗜读书，过目成诵，住京都时，每夜燃烛数寸，用以读书，阅经史，工诗赋，史学造诣尤深。任职期间，在勤政敬业的同时，还以为皇上收集诗稿之名，收集掌握了大量和坤营私弄权、贪赃枉法

和谋害百姓的证据。嘉庆三年（1798）年底，胡长龄率先弹劾和坤，引得朝野震动。

嘉庆年间，和坤倒台，家中被抄，人们发现朝廷大臣与和坤都有往来，唯独没有胡长龄的只字片言。原来用乌贼鱼墨汁写字，时间一长，字迹就消失了。由于胡长龄的正直和才干，得到嘉庆皇帝的赏识，官职逐步提升，位至礼部尚书，兼户部职。胡长龄的文才、清名，得到世人称道，南通人更引以为荣。

关于胡长龄，南通民间一直流传着不少故事。有个关于胡长龄巧对对联的故事流传最广。说的是当年胡长龄进京赶考时，因囊中羞涩屈居在京城的一个城隍庙，但是胡长龄才气横溢，声名远播，连当朝皇帝乾隆也听说了胡长龄的名字。乾隆来了兴趣，当即决定与主考官一同面试胡长龄。据说君臣二人乔装打扮一番后，以商人面目来到城隍庙。乾隆见胡长龄眉清目秀，相貌堂堂，心中先欢喜了。主考官邀饥肠辘辘的胡长龄上街用餐，胡长龄也不推辞，不卑不亢地跟随二人出了庙门。路上，乾隆皇帝对胡长龄说：“你家住通州，就以通州为题对副对联如何？”见胡长龄应允，乾隆出上联曰：“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胡长龄听了，以手指着街上的当

铺，对曰：“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主考官一听，连声说好，并接口问：“你说当铺可当东西，不知南北可当否？”胡长龄摇首说：“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水火怎好当呢？”乾隆皇帝听罢大悦。

胡长龄为人正直不阿，又同情百姓疾苦。传说胡长龄主试山东期间，曾遇到一桩没被县官审错，却又很冤的棘手案子。原来，一个无赖入门盗窃，后面十来个贫苦农民也跟着后面从大门进去拿东西，结果都被抓了。按大清刑律规定，凡盗窃，只要是从大门入内就算明火执仗的强盗，不分主犯从犯，一律问斩。如此，这些农民就必死无疑。胡长龄仔细阅看卷宗后，发现这些农民刚抓就都从实招认，既是从犯又是初犯，且都追悔莫及。机智的胡长龄想了一下，对主判官说：“我们不贪赃枉法，意在救人，你看能否变通一下，在‘大’字上加个点？”主判官也同情这伙农民遭遇，即连说可行。于是，他就把卷宗里“大门”的“大”字加上了一点，改成了“犬门”。情理上从“犬门”出入者，只能算作小偷，不是强盗，可以从轻发落。这十来个农民终于免于死。“一点救众生”的故事也流传了下来。

嘉庆十九年（1814），胡长龄由于劳累过度，不幸病逝于回乡途中。

民国时期典当行的利率

□程太和

史海回眸



2020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将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由年利率24%~36%，调整为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发布的1年期LPR（3.85%）的4倍为例计算，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15.4%，相较于过去的

24%和36%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回溯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的标准可以发现，在2015年之前，司法系统对于民间借贷利息的规定是“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的4倍”；而“两线三区（两个点：24%和36%，形成三个区间）”的标准是2015年8月份划定的，不过，按照当时的贷款利率计算，新规定与原规定相差不大。2015年年初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5.6%，而划线政策发布前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4.85%。如果按照2015年（年初至政策发布前）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4倍计算，则是在19.4%~22.4%之间，实际上与24%的保护线十分接近。而根据目前最新的划

定，8月20日公布的一年期LPR为3.85%，目前民间融资成本的司法保护上限为15.4%。

如果我们再回溯到几十年前，民国时期的民间借贷利率又是多少呢？民国时期民间借贷整体上利率是比较高的，年息大多超过24%。以典当行为例。自清末至民国22年（1933），当本利率，一般均为月息2分（即年利息为：2%×12=24%）。民国23年（1934），经地方典当公会呈请江苏省建设厅批准，统一改为月息2分2厘半（即年利息为：2.25%×12=27%），此标准一直延续到通知地区沦陷前均未变化。抗战胜利后，由于极度通货膨胀，典当行利

率较抗战前有大幅提升。民国36年（1947）月息较抗战前高达10倍以上，民国37年（1948）9月息提高到4角5分，当期1个月，利率竟高达50%。清末，通知地区各典当当期，为27个月为满。清宣统元年（1909）当期以18个月为满，至民国35年（1946）改为两个半月为满。当物人交当物品，典当行开始“当票”，不记当户姓名，只记当票号数、当本金额、当人日期等，当物人必须在限期内备款取赎原物，如逾期不赎，即为满当。典当行利息计算方法，当物在1个月内取赎者，无论日期长短，以1个月计息，足月后5日内不计息，6日即作1个月计息，称为“月不过五”。

55年前的“劳动手册”

□夏俊山

传家宝



日前，笔者整理收藏的资料，发现了一本55年前的《劳动手册》。翻阅之后，一页页远去的历史仿佛又浮现在眼前。

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共中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以下简称《二十三条》），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的“小四清”运动上升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的“大四清”运动。江苏的“大四清”启动于1964年。“江苏省委为贯彻执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决定对全省城乡‘四清’运动的部署，加以重新调整，要求从当年秋冬起，农村每个专区集中搞好一个县，全省搞好七个县，即新沂、涟水、大

丰、邳江、海安、句容、太仓。”（见《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第493页。）笔者当时刚上小学，记得老师教给我们一首歌：“工作队下乡来，贫下中农笑开颜；阶级队伍组织好，地富反坏垮了台。我们团结中农向前进，资本主义根子挖出来，挖出来……”

按照省委要求，为防止四不清干部和阶级敌人糖衣炮弹的进攻，工作队开展工作，有着铁的纪律，严格的规定，例如工作队员必须跟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

同吃，也就是工作队员不能搞生活特殊化，要一律吃派饭，不允许另开小灶，也不准吃群众的鱼肉蛋。同住，中国科学院文联主席郭曰方，是第一批在海安搞“四清”的工作队队员，他来到海安县。“按照分工，郭曰方住在平等公社明道大队一户姓吴的贫穷农民家里。”“吴家7口人，5个孩子，大的12岁，小的1

岁，5个孩子挤住在一间破旧的草屋内，只有一张破床，一条破被子。男女主人住在另一间屋子里的西头，在中间用篱笆泥墙隔开，郭曰方住在另一头。”（见《郭曰方的诗意人生》郑培明著，江西高校出版社2010年出版），至于“同劳动”，当年的工作队员王友和在《忆“三同”》一文中写道：“按照社教工作队团部的要求，工作队员每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少于三个半天，领导要带头参加劳动。当时，我们在《‘四清’通讯》上看到题为《老匡赤脚下田》的报道，说的是双楼社教工作团团长、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事迹，对工作队员们鼓舞很大，大家都尽量争取更多的时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参加的农活有除草、施肥、治虫等”（见《海安文史资料》第11辑108页）。

海安县是江苏省委确定的“四清”运动试点县之一。四清工作队进村后，第一

步是扎根串连。即依靠不担任干部的贫下中农，揭发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四不清问题。工作队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将干部分成四类，一类是好干部，二类属于四不清问题较轻的，三类是问题比较严重，四类是问题严重的。笔者所在的海安县南莫公社杨舍13队，工作队发动贫下中农揭发了生产队长孙磐山不跟社员同劳动，经常多吃多占的“罪行”，孙磐山被斗争后，离开了生产队，到福建山区当了一名砍运毛竹的零工，直到1968年才遭当地清理回到老家。

“四清”历时4年，全国先后参加工作队的各级干部、教师、学生和其他人员有200多万人。如今，我发现的这本55年前的“劳动手册”，记载的是当年社教工作队雅周分团团长的刘开渠参加生产劳动的情况，它打开了一扇观察“四清”工作队员“三同”情况的窗子，是很少见到的实物资料。